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想像馬來亞，操演多元文化—五0年代新加坡華文知識界的馬來亞意識

doi:10.30135/RTR.201207.0013

人間思想, (1), 2012

作者/Author：柯思仁

頁數/Page：170-19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135/RTR.201207.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想像馬來亞，操演多元文化

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知識界的馬來亞意識

「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態和現實操演，半個世紀以來，在多個種族群體——74%的華族、13%的馬來族、9%的印度族，以及少數的其他種族——組成的新加坡，並不算陌生。¹不過，什麼是新加坡現實脈絡中的多元文化的理想的或可實現的模式，長期以來一直是各方（包括政府、民間團體與個人）各自進行論述與操演。社會學者蔡明發認為，自獨立（1965年）以來，新加坡政府即以多元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依據，使其有關種族的政策制訂與行政方式的執行得到合理化，不過，其過程中往往忽視不同種族群體在不同社會結構與政治情境，以及歷史時期的差異性。²在社會生活的層面上，政府近年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模式，例如在學校舉行種族和諧日，或鼓勵各族認識其他族群的食物、服裝、節日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被認為是層次比較淺薄，沒有達到比較深入的交流與了解的效果。新加坡外交家許通美就把各個種族群體比喻為不同的「文化盒子」（cultural boxes），認為不同種族的新加

- 1 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新加坡居民（包括公民與永久居民，但不包括短期工作居留的外國人；後者占總人口的超過1/3）中的各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見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2011。這個種族比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大致沒有變動。在大量吸收外來移民的近十年來，種族比例的可能變動引起少數種族社群的焦慮時，新加坡政府也一再強調維持這個種族比例的承諾。
- 2 Chua Beng Huat (2003)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ontrol", *Race & Class* 44(3), pp.75-76.

坡人對其他族群文化缺乏深層的認知，在思想交流上顯得膚淺(intellectually shallow)。³ 另一方面，在某些具有批判性的獨立評論家如契連·喬治的眼中，政府以種族作為劃分的社會管理方式，例如鼓勵各個種族成立自助團體與保留各自文化傳統的作法，被視為強化種族之間的區隔，不利於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種族融合。⁴ 這些觀察與批評，顯示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的新加坡的國族想像中，多元文化的理念受到各種社會與政治現實的牽制，也意味著多元文化是不同利益與意識形態進行角逐的場域。

新加坡獨立以來由政府所主導與操演的多元文化主義，很大程度上深入一般民眾的認知結構中，也有效地形成目前各個種族群體的各自發展而又在某個層面上有所互動的現狀。與此同時，對於種族群體互動方式懷抱某種理想主義的民間團體與個人，也通過不同的方式訴求於比較深層的跨族群的文化與思想交流。八〇年代初以來，在獨立二十年之後的政治統合與經濟騰飛的社會脈絡中，有關多元文化課題的闡述與辯論，無論是涉及多元族群的現狀、各族群互動或統合的方式，或多元文化的理念等，都是在以新加坡作為一個新興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與建構的基礎上進行，顯然是必須在後獨立的歷史現實框架之內想像與操作。與此同時，以3/4的華族組成人口大多數，以及其他種族群體作為具有關鍵影響力少數的新加坡，各個種族在群體內的認同與群體之間的利益協商過程中，尤其是在種族群體內的自助角色經由務實性政策而被鼓勵與強化的脈絡中，多元文化主義的想像，從各個種族群體的內在認同與利益的角度來說，也往往展現具有差異性的論述方式與具體形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幾個主要種族社群也並非具有一致性的特質。殖民地時代的以統治為目的的英語源流教育系統，一方面某個程度上打破種族的隔閡而促成少數不同種族成員之間的互動與融合，另一方面，各個種族的

3 Tommy Koh (2002) "Progressing or Retrogressing? – A Dialogue o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ism", *Tangent* 5, pp. 100-104.

4 Cherian George (2000)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pp. 160-161.

母語源流教育系統也同時存在，但往往並不如前者般得到殖民地政府的資源協助。同一個種族群體內的不同成員，在分別經歷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體系而接受不同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教育，也就形成同一個群體的內部差異性。統一流源的國民型學校在八〇年代中以後才初步完成教育語文的統合，不過，歷史上留下來到經由語文而形成的差異，以及至今為止某個程度上強調各族母語的政策，也使得各個種族群體，以及群體內部，因為語言的差異而對國族想像與多元文化理念有著不同的詮釋與期望。

多元文化的概念，在新加坡獨立之前就已經存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反殖民統治與爭取獨立的抗爭過程中，也就是20世紀五〇年代，更是社會與政治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不過，在五〇年代的歷史脈絡中，「獨立」的概念並不是指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而是一個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擺脫英國殖民統治而成為獨立的國家。事實上，在新加坡於1965年成為獨立國家之前，殖民歷史上的新加坡，無論是從地緣或文化的角度來看，一直都是作為馬來亞的一個部分。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獨立國的目標，經歷五〇年代的種種政治變動，曾經在1963年實現，不過，兩年之後，新加坡就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五〇年代是新加坡歷史上社會與政治運動最活躍的時期，主要的推動者是在殖民地統治下的接受華文教育的華人群體（一般歷史論述中稱為「華校生」），尤其是以民辦的華文學校作為運動與思想推進的平台。華校生在爭取馬來亞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中，獨立馬來亞的國族想像成為主要的願景，而當時的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態與操練方式，也與馬來亞的國族概念，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新加坡當代最重要的戲劇家、公共知識分子郭寶崑（1939年至2002年），自八〇年代中以來，以多語言劇場形式、跨族群和跨語言的文化思想論壇等，創造各族成員互動的共同空間，被視為當代多元文化的實踐家與思想家。郭寶崑在2002年談到他的多元文化理念的源頭，提及他在五〇年代所觀察與經歷的社會氛圍與思想：

當時〔五〇年代〕就有很強的三大民族思想，三大民族共同友好，共

同建設一個馬來亞。所以在五〇年代，到處都會有那種 poster〔海報〕。我就會看著這些 poster，「[belajar] bahasa kebangsa[an] kita」——學我們的國語。國語週，華校生很多人學，很多人不願意學英語，覺得那個是殖民地的語言，排斥。我在牢裡〔1976年至1980年〕就遇到好多個以前搞運動的排斥、不學英語，後悔得不得了。他們的成績都非常好，就是不上英文課，但是都學馬來語。後來記得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意識上，多元民族的馬來亞思想，在中學到南大〔南洋大學〕——南大出現了耶亞華〔讀中文系的馬來族〕，在馬大〔馬來亞大學〕、新大〔新加坡大學〕沒有出現。……我們要友好，我們要互相了解，我們要溝通，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⁵

郭寶崑的這段回憶與對於過往的評述，相當能夠概括那個時代的幾個特點：首先，包含華族、馬來族、印度族等三個主要種族在內的馬來亞概念，是形成於戰後的反殖民統治運動的脈絡中；馬來亞意識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對於英國殖民統治的反抗。由是之故，被視為具有壓迫性的、殖民統治者語言的英語，被具有抗爭思想的人所排斥，而被視為三大種族團結的、未來國族象徵的馬來語，則被人們所擁抱與推崇。其次，反殖民與多元文化的思想，主要產生自華文教育的華族群體之中（以南洋大學為代表），而講英語的華族成員（殖民地政府所辦設的馬來亞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則被認為是對於有三大種族組成的未來國家毫不關心的。從戰後（尤其是五〇年代）的新加坡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角度看來，接受華文教育的華族社群成員，正是這個時期反殖民統治、爭取獨立運動中的主要推動者與論述者。

本文論述的對象「新加坡華文知識界」的思想與觀念，部分是以各華文

- 5 柯思仁、陳慧蓮(2011)〈口述歷史訪談〉，收於陳鳴鸞主編《郭寶崑全集·第八卷·訪談》，新加坡：實踐表演藝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頁211。南洋大學是由新加坡華人社群領袖倡議，並在東南亞華人支持下，於五〇年代中由民間力量創辦的華文大學；馬來亞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則是英國殖民地政府所辦的以英語為教育媒介語的大學。

學校由學生寫作、編輯、出版的刊物為主要根據文本。一方面，五〇年代的華校學生在籌辦各種課外活動，包括刊物的出版，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這些學生也是這個時代的風起雲湧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刊物成為他們表達想法的主要場域，也成為各校學生之間思想交流與行動連結的主要媒介。另一方面，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新加坡被日本占據三年半，其間各級學校停辦，戰後復辦的華文中學出現許多超齡學生，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具有獨立想法與成熟組織能力的青年之中，也有不少成為社會運動與學校活動的領導者。⁶五〇年代的華文中學，包括三年中學與三年高中，可以說是五〇年代華文知識界的主要活動與論述場域，相對於以商人和勞工為主的外在社會，具有更強烈的活動力與更濃厚的理想主義。

一、馬來亞意識形成與馬來亞文化創造

馬來亞意識的產生與形成，並引發文化界與知識界的廣泛回應，是在戰後逐漸升溫的反殖民統治浪潮中。就如郭寶崑所說的，「我們要友好，我們要互相了解，我們要溝通，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在對於外來統治力量的抗拒與本土意識生成的兩股發展趨勢之中，馬來亞意識成為以華文為媒介的華人知識圈子裡的關注焦點。以英語為媒介的華人，也就是已經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幾百年來多代定居的海峽華人，背景與意識皆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被前者視為與殖民統治者合謀的壓迫者。新加坡公民社團「圓切線」在2007年主辦的一個以五〇年代歷史的論壇，邀請分別為華文教育背景的韓山元與英文教育背景的許黛安從個人經歷敘述歷史的參與，以「生活在兩個世界」為

6 新加坡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團體，是1955年反殖民運動高峰期成立的全新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中學聯），由學生領導的跨校組織，直接參與社會與政治運動。不過，在成立不到一年之後，中學聯就被殖民地政府解散，而不少學生領袖則在其他的社會領域中繼續參與社會運動。中學聯的簡史，見林清如（2012）〈中學聯，一個時代的絕響〉，收於李慧玲、曾昭程、丁劭詩編（2012）《逍遙遊：1945-1965，新加坡的中學生活與課餘活動》，新加坡：圓切線、八方文化創作室，頁195-214。

題，就很具體地顯示兩種語文背景的華人在反殖民運動時代的經歷與觀點的差異之大。⁷ 本節引述的部分文獻，傳統上是在馬來亞華文文學理論的範疇。被框定為「文學」的馬華文化場域，在五〇年代之前，一直都是文化思潮的主要論述空間。以文史家方修主編的具有典律意義的《馬華新文學大系》(十卷)為例，除了五卷分別收錄小說、散文、詩歌和戲劇，另有《理論批評》與《劇運特輯》各二卷。後四卷中所收錄的，都是發表在各報副刊的評論性文章，有不少超越狹義的文學範疇，而是對於更廣泛的社會與文化現象的評論。換一個角度，在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中，這些評論往往表現對於現實社會與思想的關注，也正好展示這些作者的文化思想。上述的幾場關於本土意識的論爭，在這個歷史脈絡中，展現的不僅是文學思潮，更是該時代知識界所關注的文化與社會思想。

以馬來亞的土地與社會為認同對象，並以馬來亞意識為理念，是在戰後的反殖民統治的社會脈絡中發生，不過，華文知識界對於本土的關注，卻是從20世紀初開始，就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述。19世紀初以來，主要自中國南方閩粵兩省來到馬來亞的華人，認同歸屬向來是面向中國，展現的主要是一種以中國為本位的「僑民意識」。二〇年代中後期開始，本土意識的覺醒和提倡就逐漸形成知識界的論述重點。第一個關注本土的主要論述，是在1927年通過在新加坡出版的《新國民日報》的副刊〈荒島〉展開。〈荒島〉的編輯與作者，首先提出文藝作品中需要加強「南洋色彩」。⁸「南洋」是歷史上從中國觀點對於東南亞的稱謂。雖然「南洋色彩」的提倡意味對於生活土地的關注，不過，從後置的角度來看，一方面，這種關注仍然脫離不了僑民的視角，另一方面，「南洋」的寬泛地理概念也無法完全對焦於提倡者所關注的馬來亞。

以具體的「馬來亞」為概念，提倡本土關注與創作，是在1934年。廢名

7 許黛安、韓山元(2012)〈生活在兩個世界：韓山元與許黛安對話〉，《逍遙遊：1945-1965，新加坡的中學生活與課餘活動》，新加坡：圓切線、八方文化創作室，頁3-42。

8 楊松年(2001)《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頁33-83。

(丘士珍)在新加坡報章《南洋商報》副刊〈獅聲〉上發表文章，提出「馬來亞地方作家」的概念，認為「馬來亞的文藝作家應該老實地堅決地在馬來亞地方有組織地團結起來共同擔負推進與提高馬來亞文藝的社會任務」。⁹戰後不久，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一群作家通過討論會和報章上的評論文章，提出相對於「僑民文藝」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概念，引起文藝界與知識界的廣泛參與和辯論。¹⁰論爭開始不久，署名漂青的作者表示：

今天，馬來亞人民正為著要求民主自由，民生改善，民族解放而進行艱苦奮勵的鬥爭，這就是大家所共同呼吸著的客觀現實。而在這現實的基礎上，馬來亞的民主，民族運動的鬥爭任務，卻不就是很顯明的作為今後馬華文藝的最主要的中心[內容]嗎？¹¹

這場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述，主要是在文藝界中展開，在各個馬華文學史的敘述中，被看成是史無前例的、具有深遠影響的關於文藝中本土意識的重要建構。

「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發生在戰後的殖民地政府與反殖民統治勢力進行激烈角力的時代。從上引漂青的文字，即可看出文藝範疇中的馬來亞意識，與社會、政治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接下來的整個五〇年代，這種思想基本上貫徹各種文化論述之中。1956年，馬來亞本土政黨與英國展開馬來亞獨立課題的討論。1957年，由馬來亞半島各州所組成的馬來亞獨立。在這個獨立運動熱烈展開的時期，新加坡與馬來亞的文藝界，提出愛國主義運動。新加坡作家杜絲工(杜紅)提出「愛國主義文學運動」的理念，認為愛國主義

9 廢名(1934年3月1日)〈地方作家談〉，《南洋商報·獅聲》。轉引自方修主編(1972)《馬華新文學大系·理論批評一集》，新加坡：世界書局，頁259-262。

10 楊松年(2001)〈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頁85-102。

11 漂青(1947年10月4日)〈關於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星洲日報》。轉引自苗秀編(1971)《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新加坡：教育，頁199-200。

airiti

文學應該包括：

1. 加強馬來亞人民的國家觀念。因為這是愛國主義的基礎，如果人民的國家觀念淡薄，愛國主義是無從產生的。目前馬來亞人民的國家觀念是很微薄的，這是由於民主思想的備受壓制，民族主義之被殖民地主義盡力縱肆而致。最顯明的例子就是大批馬來亞青年歸返中國及印度，這說明了馬來亞人民在長期被奴役中，國家觀念已經支離破碎。因此，愛國主義文學第一就必須粉碎民族主義的抬頭，強調馬來亞三大民族的團結，加強人民對馬來亞的國家觀念。……

2. 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激發人民的愛國精神。在殖民地主義者的統治下生活的人民，遭受種種剝削、壓迫、奴役與殘害，這些血腥的生活便是愛國主義文學創作的泉源。……愛國主義文學，就負有這個任務：指出人民痛苦的根源，指出一條擺脫痛苦的道路。這就是：馬來亞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還是處在被剝削、被壓迫的殖民地地位，要擺脫這些痛苦就必須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馬來亞國。¹²

雖然這個時期的新加坡還不是政治概念的馬來亞的一部分，但是，殖民歷史上新加坡被視為馬來亞半島的一個部分，民間的生活與互動也是以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為一個整體。戰前的思想界所關注的，主要是文學與文化的地方色彩與本土關注，並沒有顯現政治性的思考與國族的想像。向來具有深厚現實主義傳統的文藝界，在戰後的論述中，把反殖民統治與爭取獨立的社會運動，看成是文學運動的戰鬥夥伴。文學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共同想像一個多元民族馬來亞的國家概念，作為華文知識界跨領域、跨媒介的共同目標，並形成具有高度共識的知識社群。文中所提出的「馬來亞三大民族的團結」，成為重要的國族符號，被想像為抗爭與建國的基礎。從1956年開

12 杜絲工(1956年4月27日)〈展開愛國主義文學運動〉，《匯流》創刊號。轉引自苗秀編(1971)《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新加坡：教育，頁304-306。

始，新加坡也展開與倫敦當局交涉自治的條件，到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與馬來亞、沙勞越、沙巴組成馬來西亞，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其間的建國想像都延續了這種結合華族、馬來族、印度族等三個主要種族的觀念。

文藝界對於馬來亞概念的論述，已經有不少學者有所觀察與評論。文學以外的場域，也可以看到不少類似的論述，觀點與修辭方式都非常相似。從文學延伸到範圍更廣的藝術界，論述重點同樣地以馬來亞為想像的對象：

正當要發展馬來亞藝術的今天，也正當意識到應該加緊學習展開創作以滿足當前馬來亞廣大人們迫切需求的今天，馬來亞的青年漸漸地越來越多地而且堅強地站起來為馬來亞的藝術而埋頭苦幹，這不能不說是馬來亞歷史最光榮的一頁！

……

真正的馬來亞藝術工作者，應該認定馬來亞當前的處境，一面多方面地加緊學習，一面生活在馬來亞大夥兒的生活中體驗廣大人們的生活。……馬來亞的藝術是不能由一兩個人去搞的。只要與大多數人生活在一起，多方面接觸，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體驗到的拿出來。……可貴的是，這樣的創作是與馬來亞大多數人的血脈相通，骨骼相連的，是馬來亞的人們所熱愛的，也是最能代表馬來亞的作品的。¹³

這裡所說的「馬來亞藝術」，應該是包括戲劇、舞蹈、音樂、繪畫等形式。五〇年代初開始，新加坡的華文中學開始有活躍的藝術活動。除了各種藝術形式以專門的學校社團為活動單位，更有結合戲劇、舞蹈、音樂、歌唱等各種藝術形式的綜合性演出，最盛行的一種是各校的畢業生敘別晚會。這種遊藝會的演出形式，基本目的是在籍學生為歡送畢業班同學而舉行，與此同時，學校演出廣泛邀請友校代表參與出席，也使得敘別會成為各校學生連

13 莫落(1957)〈堅決發展馬來亞的藝術〉，《中正中學高中畢業班特刊》，頁9。



圖一：《中正中學高初中畢業班敘別晚會演出特輯》封面

結交流的重要平台。

1963年，在各校的助學會與跨校學生組織維護華文教育委員會的策動之下，各校的敘別會集中在12月舉行，各校之間的活動與人員交流也更為頻繁密切。這一年，各所華校也結合行動，以「星洲1953年度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的名義，舉辦一次大規模的遊藝會，為該年宣布辦設的東南亞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籌募建校基金。¹⁴無論是學生運動與藝術活動，在各華校之中都最為活躍的中正中學，在1959年舉行的敘別會，出版的特刊封面設計圖，表現了五〇年代普遍的多元文化馬來亞的想像(圖一)。

設計圖的前景，是三個人物剪影：中間的人物頭戴方形的頭飾，明顯是象徵馬來族；右邊的人物頭髮微卷，象徵的是印度族；左邊的則是華族。三人手臂互搭，並肩前行，高舉寫上「健康文娛」的旗幟。「健康文娛」的口號，是用以對抗「黃色文化」，而後者被視為在殖民地政府的縱容之下在新加坡社會上廣泛流行。¹⁵在這個脈絡中，「健康文娛」的提倡，也意味著對於殖民統治的反抗。圖中背景的白色剪影符號：中間的高聳柱體物與右邊的獅頭，是落成於1956年的獨立橋(Merdeka Bridge)的橋頭具有高辨識度與象徵意義的石柱與石獅。獨立橋的命名，是為了慶祝馬來亞將在1957年獨立，橋頭的石雕雄獅，也被稱為獨立獅(Merdeka Lion)。整體圖像的象徵意義相當明顯，

14 柯思仁(2011)〈一九五〇年代的新加坡學生戲劇活動〉，收於陳仁貴、陳國相、孔麗莎編(2011)《情系五一三：一九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八打靈再也：策略諮詢研究中心，頁218。

15 「黃色文化」作為殖民主義的符號，以及新加坡在1953年與1956年的兩次主要的「反黃運動」，是反殖民統治運動的重要象徵，這是另一個值得展開研究的課題。

airiti

與當時的知識界普遍論述一致，即結合多元種族，反抗殖民統治，想像獨立建國。

除了文學與藝術界，其他領域也展現對於「馬來亞意識」概念的支持與倡導。自然科學出版社的月刊《自然科學》，創刊於1958年，是在新加坡出版的普及性科學雜誌，以推廣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不少文章在介紹數理化知識的文字中，也出現類似的「馬來亞意識」論述。1959年7月出版的《自然科學》第8期，第一篇文章題為〈科學和經驗〉，開始不久就說：

某位具有三十多年豐富經驗的老教育家，快將近六十歲了。他昨天對馬來亞化問題提出質疑，一位華人祖家觀念太過濃厚，不容易教育而成效忠新興的小邦國。馬來亞意識和祖家、或祖國觀念，本來沒有衝突；唯有多了歲數的人，放不下沉重的包袱，才發生這樣的疑問。但是，問題雖然並不存在，而出自這種疑問的行動，往往直接破壞建立馬來亞的意識。¹⁶

文中提到「老教育家」對於馬來亞意識的懷疑，在作者與讀者皆以年輕人為主的刊物（如華校出版的畢業刊、文藝期刊、演出特刊等）都沒有見到。年齡階層顯然是對於積極的馬來亞想像的一個重要劃分方式：以在學的與剛畢業的華校生為代表的年輕群體，是對於未來式的、充滿理想化的馬來亞想像最抱有憧憬的。這篇文章重點論證的是，過去的經驗不是科學發展的主要根據，而科學應該是一種「想像的科學」，作者一開始就提出「如果歷史是知識，那麼知識只是一部很不好看的電影；如果只有經驗才是科學，那麼科學好像一條老牛和它的破車。」¹⁷ 這種聲音呼應著文藝界的觀點，通過科學理性的方法，使馬來亞的想像更具有時代的合理性，並成為當代青年的共同信仰。

16 芳季（1959年7月15日）〈科學和經驗〉，《自然科學》第8期，頁1。

17 同註16。

作為一個群體，自然科學出版社在1959年6月舉行了一次聚會，同時慶祝新加坡自治與該社成立一周年紀念。這一年的5月30日，在新加坡的立法議會選舉中，人民行動黨獲得51席中的43席，組成第一屆自治政府，被稱為「人民政府」，並由李光耀出任總理。選舉後不到一個月的慶祝會上，社長、編輯部顧問與該社代表在致詞時，都流露出對新任政府的支持與期待，並把科學的功能與建國的任務結合起來。社長傅成田一開始就說：「新加坡能夠獲得自治，是星馬全體人民與殖民主義鬥爭所得到的勝利」，「我們歡迎建國高潮就要到來，……毅然克服種種內在和外在的困難而擔負起『普及科學教育，提高科學水準』的重大責任」。¹⁸編輯部顧問方至認為「科學工作者，不但要為科學而科學；並且要為文學而科學，為藝術而科學，為法律，典章，制度而科學」，並「希望馬來亞科學工作的同工們，站穩自己馬來亞的立場」。¹⁹另一個代表謝世涯則強調：「祖國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和其他的文化工作者一樣，首先自己就必須培養一種愛國主義的思想」，也特別說明「我說的祖國是包括星馬而言的。」²⁰

從當前新加坡歷史敘述的角度來說，1959年的選舉與政府成立，意味著新加坡經歷自治階段，最終走向獨立建國。敘述中的「建國」，指涉的是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不過，在1959年的那個時代，新加坡的自治是一個建國道路上的旁枝，而「建國」的意義是馬來亞與新加坡組成的不受殖民主義控制的獨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華文知識界繼續共同想像著一個由三個主要種族所組成的，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

二、跨族群連結與多元文化操演

華文知識界在五〇年代的馬來亞想像的論述中，雖然不斷提到包括華

18 傅成田(1959年7月15日)〈我們的意見〉，《自然科學》第8期，頁4。

19 方至(1959年7月15日)〈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自然科學》第8期，頁5。

20 謝世涯(1959年7月15日)〈迎接建國工作的到來〉，《自然科學》第8期，頁6。

族、馬來族、印度族的三大種族的連結與以這三大種族為基礎的多元文化創造，在實際的操演中，印度族在這種想像中的再現毋寧是比較在象徵層面，而對於馬來族的認識與接觸則是華文知識界的主要對象。作為馬來亞與新加坡兩地加起來最大種族的華族與馬來族，而且比例不分上下，分別有百分之四十幾，總計占人口的近九成，而印度族相形之下是一個小得多的群體。²¹從華族的觀點而言，一方面，與馬來族的連結意味著兩大群體的結合將形成最有力與有效的抗爭力量，另一方面，馬來族作為馬來亞的原住民族身分，如果能夠取得他們的合作，也使得被視為外來者的華族的抗爭行動具有更大的合法性。²²為了達到這種連結，最直接的行動，表現在華文知識界對於馬來文的熱衷學習與大力推廣。尤其是當馬來亞在1957年獨立時確立了馬來文在憲法上的國語地位之後，熱切想像與馬來亞合併的新加坡華文知識界，更是以學習馬來文作為追求這個理想的途徑：

我華族人士當此合併問題障礙重重的時候，更應表現我華族傳統的忍讓精神，和他族攜手共處，絕不能存有絲毫的民族優越感……

新加坡人民既然承認星馬為一家，那麼承認巫文[馬來文]為我們的國語是天經地義的。……巫文是各民族所易學和易懂的，我們希望它在自治的新加坡同樣受到尊重和應用……²³

-
- 21 五〇年代，馬來亞與新加坡並沒有發表過以種族類別進行統計的人口數字。最接近的資料，是1947年的統計數字。1947年，新加坡的總人口是 940,828，其中馬來人有 115,690 (12.30%)，華人有 730,133 (77.61%)；馬來亞的總人口是 4,908,086，其中馬來人有 2,427,834 (49.46%)，華人有 1,884,543 (38.40%)。兩地相加的總人口是 5,848,910，其中馬來人有 2,543,524 (43.49%)，華人有 2,614,667 (44.70%)。見《南洋年鑒》，新加坡：南洋報社，1951，頁乙 11-12、丙 22。
- 22 在五〇年代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合併的政治中，馬來亞與新加坡的華族與馬來族的比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對於吉隆坡的權力中心來說，新加坡超過 3/4 的華族人口，將對整體馬來亞的種族比例產生重大影響。
- 23 今明(1959)〈新加坡自治展望〉，《中正中學高中畢業班特刊》，頁 5。

馬來文被賦予國語的地位，也被視為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的共同語文，在華文知識界中是普遍認可的。長期以來的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各種族之間缺乏深層交流，而形成以種族群體劃分的社會區塊。人口中的大比例與強大的經濟能力，使得華族作為馬來亞的外來種族，可以形成自給自足的社群，而五〇年代之前與中國的政治認同聯繫，以及五〇年代以後繼續與中國保持的文化認同聯繫，也使得華族的在地認同形成的過程中保持一種相對優越的姿態。不過，在馬來亞建國的鬥爭與想像中，華文知識界顯然有意識的倡導對於這種優越感的壓抑，並接受以原住民語文作為團結各種族的象徵。

學習馬來文，在這種歷史脈絡中，成為五〇年代的華文知識界中的熱潮。高中時期就意識到「我國是由三大民族組成的國家，尤以馬來民族為重」，而「學好馬來語文，和馬來民族在文化上的溝通是很重要的」的林煥文，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就提到南洋大學開辦不久的1956年，因為懂得馬來文，南大的學生領袖特別邀請他教同學馬來文，「每週在大禮堂上一次大課」。南大學生會成立時，因為他懂得馬來文，被推舉為第一屆的主席。從南大化學系畢業之後，他先後被聘為南大現代語言系的馬來文助教和講師。²⁴與林煥文同一個時期的接受華文教育的人，例如南大政治經濟系第一屆的楊貴誼，也參與為南大學生主辦的馬來文課，後來也在南大現代語言系的馬來文課程任教。²⁵馬來文並非大學的正式課程，可是，選修馬來文的南洋大學學生，在1958年有約300人，占學生總數的23.5%，到了1959年，學生人數增加超過一倍達800人，占學生總數的46%，熱烈的情況由此可見。²⁶林煥文和楊貴誼在教學與推廣馬來文時，因教學材料的不足，分別參與不同版本

24 林煥文(2011)〈我學習馬來文的回憶片段〉，《情系五一三：一九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頁158-163。

25 潘星華(2005年12月10日)〈出版過12本馬華詞典從膠童到馬來文專家的楊貴誼〉，《聯合早報》。

26 莊華興(2004)〈南大人與馬來語文發展：廖裕芳和楊貴誼的貢獻〉，收於李業霖編(2004)《南洋大學史論集》，八打靈再也：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頁241。

的馬來文與華文對照的工具書的編撰工作。馬來文及其文化在華族群體中的推廣，即使是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而馬來文的地位在六〇年代中開始逐漸退落之後，仍然是他們生命中的重要事業。

華族青年之間在五〇年代的學習馬來文熱潮，另一個隱含的因素，是在殖民地統治的歷史中，華族和馬來族的母語教育，一直處於邊緣化的狀態。楊貴誼在回憶他開始學習馬來文的動機時表示，「因殖民主義者對民族語言的敵視」，使他「下決心學好民族語言，包括母語〔華語〕和馬來語」，²⁷ 很大的程度上，說明了弱勢群體連結，形成對抗殖民地的壓迫性統治的意願。

長期以來，殖民地政府並沒有給予各種族語文源流教育重視。華族與印度族的學校，是由各種族社群內部結集資源以謀發展。馬來文源流學校雖然由政府開設，不過只有小學六年。²⁸ 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殖民地政府發布《新加坡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十年計畫》，²⁹ 提出在小學階段應以學生的母語為教學媒介，目的是為了讓種族社群辦校以紓解政府的教育資源分配的壓力。³⁰ 不過，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之後，殖民地政府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東南亞各地的威脅增加，迅即發布《1950年常年教育報告書》，³¹ 語文教育的原則路線有所逆轉，認為最適合新加坡的教育機構模式是英文源流學校，而作為母語的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只能夠以第二語文的方式來教學，並且是選修科目。³² 即使是在新加坡自治前夕的立法議會成立之後，在1956年所發布的《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也延續

27 張曦娜(2007年9月10日)〈著名馬來文化工作者楊貴誼在馬來文研究闖出光明大道〉，《聯合早報》。

28 《南洋年鑑》，頁乙36-38。

29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en Year Programme*, Singapore, 1947.

30 Neo Peng Fu (2010)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s in Singapore, 1954-1956: A Historical Analysis", 收於謝澤文等編(2010)《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七集》，新加坡：華文研究會，頁361-362。

31 *Annual Report for Education*, Singapore, 1951.

32 孔莉莎(2011)〈一九五〇年代新加坡華人移民社會的政治：緊急狀態時期身分歸屬的敘事〉，《情系五一三：一九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頁28-29。

這種立場，假設新加坡華校學生在文化上與政治上主要的認同對象是中國，缺乏足夠的本土意識，而認為各個語文源流的學校應該朝向「統一的教育體系」努力，意味著英語將成為主要的教學媒介語，而母語教育系統因此繼續被邊緣化。³³ 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也通過壓制性的國家機器，對付被懷疑受到地下共產主義勢力滲透的華文中學的師生。1950年，警方突擊華僑中學和南洋女中，聲稱搜獲馬共和中共有關的資料，並逮捕教師和學生。³⁴ 1954年，華僑中學與中正中學等華校學生擬向新加坡總督請願，反對在籍學生被要求為國民服役進行登記，遊行隊伍被警方強行驅散，警方也逮捕數十名學生。³⁵

這一系列的政策制定與具體的壓制性行動，從殖民地政府與受殖民地式的英語教育的華人的處境來看，是籠罩在二戰之後的冷戰時期對於全球性共產主義擴張威脅的陰影之中的反應。不過，在華文知識界看來，則是對於講華語的華族社群的持續壓迫，使得他們在參與建國的過程中遭受排擠與否定。華文知識界的這種從語文到教育，以致作為一個族群整體，被邊緣化的遭遇，在馬來族社群的母語教育中找到共同命運。署名挺秀的作者，即從這個角度論述馬來族在殖民地統治歷史上的困境：

巫文在舊社會中是和其他各民族語文同樣遭受到歧視和壓制。他們〔馬來族〕的語文一方面受到存有偏見的語文政策所壓制，另一方面，本身又缺乏經濟能力以自力更生，因此百多年來都不能得到發展的機會。³⁶

殖民地的統治，被視為原住的馬來族與其他非使用英語的族群的受壓迫的來源，而馬來亞的獨立則被視為各個種族社群擺脫這種困境的重獲平等地

33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Singapore, 1956.

34 同註32，頁30。

35 同註32，頁50-54。

36 挺秀(1959)〈我們必須學習巫文〉，《中正中學高中畢業班特刊》，頁26。

airiti

位的機會：

自從〔馬來亞〕聯邦憲法規定了以巫語為國語以後，巫文的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星馬合併問題的提出，更鞏固了它的地位。無可否認的，巫文在國家機構中和人民生活中受重視，已經是與日俱增了。然而，今天提高巫文的地位的政策，已經是被錯誤地執行了，一些狹隘的種族主義者，滿以為發展巫語和英語就夠了，其他各民族語文可置之不理。這和統一馬來亞各民族的政策是不相容的。……

我們是新加坡的公民，我們既然承認它是我們的國家和贊成星馬合併，我們更應該勇敢地接受一種統一的馬來亞語文。這種馬來亞語文，當然是巫族語文。責無旁貸的，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加速馬來亞民族和語文的形成，在我們的建國事業上，創下更有利的條件。國家語文形成後，是否一切其他各民族語文都要被取消呢？其實不然，它們在國家語文形成的前後，將使國家語文吸收它們的優點，是國家語文更燦爛、更輝煌！

……

學好我們的國家語文，通過它去團結各民族同胞，建設國家。這便是我們正確地對待巫文的態度。³⁷

在殖民地統治時代，英文作為殖民者的語文，具有獨尊的地位，而其他種族語文則被視為次等。上述引文的作者推崇馬來文作為新的馬來亞國族統一象徵的語文，卻也提醒馬來文被賦予國語的合法地位之後，可能會像殖民地者的語文英文那樣成為具有壓迫性的霸權語文。講華語的華族社群在馬來亞的處境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反諷特質：一方面，這個社群的經濟能力強大，數量上也占馬來亞人口的一半，另一方面，從殖民地統治時代到即將到來的獨立建國時代，都處在可能被邊緣化的社會與政治位置。這種既主流又邊

37 同註36。

緣，既強勢又弱勢的處境，在五〇年代的反殖民統治鬥爭與建國運動中，使華文知識界的行動主義論述，形成一種必須進行策略性進取的方式。這種論述，既呼籲跨族群的連結以取得鬥爭的力量，又期望得以保障講華語的華族社群的權利與利益，並在國族的想像中獲得具有尊嚴的民族地位。

對於未來的馬來亞獨立國的想像，華文知識界所支持的構想，是「多元文化」的理念，而這是建立在馬來亞意識的基礎上的。由新加坡華族社群發起的南洋大學在1953年宣布成立時，標示大學的兩大特質，其一是「溝通東西文化」，其二是「發展馬來亞文化」，而後者的理念基礎是「馬來亞為華巫印等民族和衷共濟之邦」，具體的表現則在於「南洋大學之特質在研究各民族文化，吸取各民族之菁華，陶冶熔鑄，使馬來亞文化有輝煌之成就」。³⁸另一方面，當人民行動黨於1954年創黨時，主要成員包括華校背景的如林清祥，在黨綱中也具體闡述類似的理念。創黨時發表的〈人民行動黨宣言〉中，明確地提出團結的馬來亞國家概念，是可以與語文的多元性並行不悖，表示了以多元文化作為黨的主要理念之一。³⁹即使在殖民地時代的由本地人所組成的政府的政策中，如1956年的《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也強調在多元種族的新加坡，各族文化應該具有平等的地位，而政府有責任指導各種族的文化團體，以促進對於他族文化的認識與接受，並逐漸整合各個種族的文化，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馬來亞文化」。⁴⁰這些重要的時代文獻中，來自社會的不同層面，都可以看到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與推崇。

各方論述中的多元文化，在文化藝術的領域中所展現的具體形態，在署名一鳴的作者發表於1959年的文章中，可見一斑：

馬來亞，這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在文化藝術上也是多元性的。由

38 南大籌備委員會(2002)〈南大創立宣言〉，收於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八打靈再也：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頁23-24。

39 “Manifesto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in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The Pioneering Years, November 1954-April 1968*, Singapore: Times Periodicals, 1980, p. 22.

40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p. 12.

於過去在長期的殖民地文化政策的阻撓下，形成了各民族的文化藝術，在分立的狀態中掙扎圖存，不平衡地發展著；可是導源於巫、華、印三大民族的各種藝術是具有著它們底特色的，而同時藝術都能給社會以重大貢獻。因此，對於我國三大民族的藝術是應該一視同仁地促進其發展的。今天，華族同胞不但有責任去發展本族固有的文化藝術，而且更有責任推動巫、印兄弟民族的文化藝術的發展，這曾經在過去被文娛工作者們所疏忽。⁴¹

作者與前述各篇引文有著相似的論述方式，首先從馬來亞殖民歷史的背景，描述殖民統治下的三個種族文化分別發展的困境，一方面是分而治之的社會政策下的缺乏互動，另一方面是各族文化向來缺乏政府的資助，而在族群各別的努力下憑靠民間的資源各自發展。華族社群通過自己優渥的經濟能力、相對完善的民間教育體制、蓬勃的社團與媒體，加上自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感召而啟發的文化與社會意識，在馬來亞的幾個以華人為主的地區如新加坡和檳城，都有活躍的文化創造與發展勢態。在建國鬥爭的過程中，作者從華族的觀點出發，展現出一種平等主義的態度，呼應著華文知識界普遍信仰的馬來亞意識。

作者所刻畫的景象，看起來是一種面向未來式的建國目標，展現這個時代的華文知識界所具有的濃厚理想主義色彩。不過，華文知識界的成員也有不少同時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與政治鬥爭的行動主義者，深刻了解他們的理想主義在現實脈絡中的政治面向。這個作者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即展現他對於多元文化在多元種族政治中的複雜性及其帶來的焦慮感：

各民族藝術的發展，是否如某些人所說的可以遵循「民族藝術的自治」原則？……其實「民族藝術的自治」是導入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思想的毀滅途徑，主張「民族藝術的自治」的人們是要使各民族藝術分道揚

41 一鳴(1959)〈談星洲文娛動向〉，《中正中學高初中畢業班敘別晚會演出特輯》，頁5-6。

鑣，甚至於認為獨崇自己民族的藝術與壓抑他族藝術而使自己成為藝術領域中的宗主，這是違反歷史發展法則的。必須要明瞭我國各民族藝術發展的不平衡，〔是由於〕外來侵略者的壓迫所致，不能以種族主義的自私觀念，排斥兄弟民族的藝術以得一己之發展。有些人提出建設我國的新文化，藝術是要使一切藝術「馬來化」，這是極端錯誤的觀念的對於我國多元性的民族藝術的態度，是不應該獨崇一是應該共存共榮的。只有各民族藝術能夠獲得合理的發展，才能兼收並蓄，吸取他族藝術豔華充實與豐富本族的藝術，否則我國各族藝術將因分立而趨於對立，結果，便會墜入種族紛爭的漩渦裡。⁴²

有如現實中的政治鬥爭所展現的各方立場、觀點、利益的衝突和協商，在馬來亞建國過程中，應該採用怎樣的文化發展模式，顯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文中所提到的「民族藝術的自治」與「馬來化」的新文化的這些概念，分別強調華族與馬來族文化的優越感，在這個作者看來，是延續殖民地時代的文化不平等的狀態，也是文化霸權主義的新的意識形態，只不過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象有所轉換，並不意味著權力關係的對等化。作者的論述中不斷提出的「多元性」，顯然是強調各族文化所具有的特質並非競爭關係，而是在多元種族的社會現實中平等共處，並通過互動來創造屬於未來的馬來亞文化。這個觀點，在五〇年代的華文知識界的各種論述，對應於接受華文教育的華族新加坡人的社會與政治行動主義，是相當普遍存在的。

回到比較靠近的年代，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當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的郭寶崑，曾經在1998年發表一篇題為〈思考一種開放文化：超越多元種族主義〉的文章，是當代知識界在討論新加坡當代的多元文化狀態時常常參照的。⁴³ 郭寶崑闡述從殖民地時期延續下來的新加坡社會裡多元社群的組成，

42 同註41。

43 Kuo Pao Kun (1998) "Contemplating an Open Culture: Transcending Multiracialism" in Arun Mahizhnan & Lee Tsao Yuan (Eds.), *Singapore: Re-Engineering Succes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airiti

並指出獨立後政府的多元種族政策在各個種族和文化社群之間交流所形成的局限。郭寶崑一開始就表明，開放文化不是放棄自我文化的大熔爐，而是一種誠懇的交流態度：願意進入其他文化，接受別人的文化，並在這個過程中生成一種更豐富多元的文化體。經過了近半個世紀，五〇年代所想像的新加坡與馬來亞的政治性合併計畫終告失敗，新加坡成為獨立國也三十餘年，郭寶崑所提出來的多元文化理念，似乎還在迴響著五〇年代華文知識界呼籲的那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目標。

Policy Studie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0-61.